

第二章 蘇聯解體前波海三國境內的俄羅斯人

「境外俄羅斯人」的形成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沙皇政府幾百年來向外侵略、擴張的結果；二是蘇聯政府繼沙皇政權之後，繼續併吞、殖民的結果。除了領土的佔領外，無論是沙皇或蘇維埃都還在佔領來的土地上進行俄羅斯化與蘇維埃化，希冀建構一個分享共同經濟、共同文化、共同共產主義信仰的新境界。但是，如同 Kaiser 教授在「The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USSR」一文中所言，俄羅斯人的地位與俄語的地位被牢固地確立在「平等中的優位」（“first among equals”）的原則之上。¹就算是向來享有高於蘇聯本土生活水準的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也不例外，在被蘇聯強行併吞後，無論是在文化上、政治上或是經濟上，一律遭到破壞，重新以蘇聯的模式建構。以強權、恐怖政治作為後盾的俄羅斯人，在波海三國很自然便成為領導者，同樣的，也成為文化、經濟利益的壟斷者。

本章內容主要說明波海三國境內俄羅斯人的歷史由來與其優勢地位的形成背景。第一節先分析帝俄時期與蘇聯時期歷代領導人，對民族問題的看法與民族政策的實施，如何創造俄羅斯人優越的地位。第二節闡述自 1940 年以前波海三國境內俄羅斯人的由來，及俄羅斯人在三國中的生活情況。第三節則詳細介紹 1940 年波海三國被蘇聯佔領後，在人口組成、政治、經濟與文化被俄羅斯化與蘇維埃化的情形。

¹ Robert Kaiser,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USSR”, in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Russians as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1996, p.87.

第一節 蘇聯的民族政策

壹、沙俄時代

自帝俄時代起，俄國政府與人民即不斷地向外擴張。恐怖伊凡(Ivan ， the Terrible , 1533-84)在 1552 年的喀山(Kazan)之役後便將莫斯科(Muscovy) 這個俄羅斯民族國家變成一個多民族的帝國，而且還決定了今後俄國對外發展的方向。之後又歷經了彼得大帝 (Peter ， the Great ， 1682-1725) 將俄國版圖擴張到波羅的海沿岸、凱薩琳二世 (Catherine ， the Great ， 1762-96) 把國家領域拓展到黑海沿岸等重要擴張時期。幾世紀以來，俄國都一直不停地向外擴張，所謂的「國境」，對俄羅斯人來說，並非是一個用來標明俄國真正統治範圍的名詞，或是俄國人與外國人最後的分界線，它只是一條在國際公法上沒有根據，在政治上沒有重要意義的臨時界線而已。因此，俄國人地理和政治的思想可說是受到「活動國界」(mobile frontiers) 此一觀念的支配，把「國界」當「前線」看，只要一旦所需的人力足夠了，他們就從這條線開始繼續向未知的領土前進。整部俄國歷史都充分表現出這一種「活動國界」的觀念，一直到蘇聯成立之後，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仍然是受此這一觀念所支配。²

當俄國建立殖民地的時候，沙皇的殖民政策是以三個交互混合的原則為基礎來實行，這三個原則是：統一 (unification)、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以及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³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如：芬蘭)，整個俄羅斯帝國皆受制於一個統一的中心。各個區域若不是直屬於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的統治，就是由一個沙皇指定的代理政府管理，而且俄羅斯的法律在整個帝國通行。雖然沙皇政府並沒有堅持公務員的成分必須是某單一族群，但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幾乎都是由俄羅斯的官員所組成，即使有殖民地

²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 F. A. Praeger, 1952), pp.2-3.

³ Vladimir Shlapentokh, Munir Sendich & Emil Payin ed.,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M. E. Sharpe, Inc., 1994), p.5.

當地的人民擔任官職，這些人也是被俄羅斯化，且衷心地為沙皇的獨裁統治而效忠。

由於俄羅斯帝國幅員廣闊，歷代沙皇無法親臨各地，基於安全的理由，沙皇政府相當有技巧地將軍隊與有組織的殖民計畫結合，把俄羅斯人移至帝國內各民族的領土去，以鞏固俄人對其之控制。除了軍隊駐守之外，俄羅斯的移民型態還包括：農民的殖民運動、貿易商人與工匠的殖民運動、技術與非技術工人的移民、俄羅斯知識份子以及一些特別的移民。⁴根據 S. I. Bruk 與 V. M. Kabuzan 兩位學者的研究⁵，1678 年時，不下於十分之九的俄羅斯人是居住在 Center Industrial、Central Agrarian、Northern 及 Lake District 四個可視為是俄羅斯人最初發展的心臟地帶，然而，到了 1917 年情況完全改變，俄羅斯人隨著政治版圖的擴張移民到他處，使得這四個區域的俄羅斯人剩下不到一半。例如，18 世紀末時，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只佔其人口數中的約 1%，1858 年時俄羅斯人的比例增加到 3.6%，到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時，俄羅斯人已經佔 4.8% 了。

俄羅斯移民與當地居民來往關係的密切程度，絕大部分是依「移民者原本在俄國的社會地位」以及「被殖民地區的文化形式」而定。受到宗教迫害而移民的俄羅斯農民在殖民地絕大部分都是過著與當地居民隔離的生活。他們與當地居民的接觸少之又少。相反地，俄羅斯的手工藝師傅、工人和小商人等等，幾乎都居住在殖民地的城市之中，且常常必須與當地的同業競爭。因此這些人會比俄羅斯農民抱持著更具敵意、自大和傲慢的態度來對待當地人。⁶

⁴ 農民的殖民運動主要是指在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區的俄羅斯農民殖民運動，這些殖民運動的結果常常迫使當地居民放棄原有的土地。貿易商人與工匠的殖民運動很明顯地出現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的伏爾加河地區。技術與非技術工人移民，這些工人移民到俄羅斯帝國中那些過去無工業而正要開始發展的地方，例如，80 年代晚期俄羅斯人就構成巴庫油田區（今阿塞拜疆境內）18-20% 的勞動力。所謂特別的移民也是由俄羅斯農民所組成的，但是這些人是受到宗教迫害而移民，大多數是移民到高加索區。V. Shlapentokh 前揭書，頁 6。

⁵ S. I. Bruk and V. M. Kabuzan, 'Dinamika Chislennosti i rasseleniia russkogo etnosa (1678-1917 gg.)', *Sovetskaia Etnografiia*, no.4, 1982. 轉引自 Paul Kolstoe,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

⁶ *Ibid.*, pp. 7- 8.

在俄羅斯帝國「唯一且不可分」的觀念主導下，俄羅斯必須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因此各地區的非俄羅斯人被迫從屬在「俄化」(Russification) 的政策之下。但是當沙皇政府試著要去限制當地人民使用當地語言，以及想要用俄文來取代當地語言時，內部族群的關係變得更加惡化。這樣的政策非但未能促成非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的同化，反倒成為非俄羅斯人反沙皇、反俄羅斯人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在波海地區，這樣的民族主義被成功地運用在 1905 年俄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內戰的群眾動員上，並使這個地區成功地從俄羅斯手中獲得獨立以及在兩次的世界大戰之間保持獨立。

除了帝國外部的非俄羅斯人民族意識提高，帝國內部本身也產生了變化。由於農奴制度的廢除以及廢除之後所帶來的一連串問題，使得廣大的俄羅斯農民與政府的關係漸趨惡劣。農民寧願將忠誠聚焦在個人意識、族群文化和鄉土之上，也不願再對沙皇和東正教效忠。而帝國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趨勢更加速了沙皇權力的瓦解。俄羅斯帝國的政治合法性不僅面對著周圍非俄羅斯人民族意識逐漸提高的挑戰，還面臨了帝國本身內部的腐敗。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失敗加重了國內政局的混亂，引起了 1917 年的革命，進一步使俄羅斯帝國覆滅。

由於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再加上蘇聯時期的擴張，共黨所面對的是一個組成份子極為複雜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歷代蘇聯領導人對於棘手的民族問題都有不同的政策與主張，不過，雖然殖民的型式與方法隨著各領導人不同而有相當的變化，但深究其本質則與帝俄時代並無二致。

貳、列寧與史達林時期

列寧思想深受馬克斯與恩格思的影響。馬克斯與恩格思並不強調民族間的區別，重視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對立。認為在各民族之內本來就已經存在著階級對立，例如工業發達的民族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無情的剝削，使得兩個階級的思想、觀念與生活完全不同，兩者之間的差異甚至比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還多。再加上工業

化、資本主義的出現，使民族與民族間的差異漸消，民族間的隔絕也淡化了，世界上只剩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區分而不再有民族的區別，這就是馬克斯國際主義的基本立論，沒有了民族的區別，自然就不需注重民族主義了。

⁷ 因此，列寧一開始並不注意少數民族在奪取政權時的重要性，只想到聯合國內、外的勞工階級，推翻沙皇以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但是，當時俄國勞工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就算是全部團結起來，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也無法實踐革命的企圖。為了能成功地達到目的，十月革命前，列寧配合當時國內與國外的情勢，不拘泥於理論，靈活運用策略，提出「民族自決權」(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的口號，以爭取那些受到沙皇統治壓迫的民族支持。

史達林經列寧授意於 1912 年末寫成的「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小冊子中，給民族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因素的穩定共同體。」⁸這個定義中漏掉構成民族最難改變的血統因素，而僅列舉一些比較容易改變的構成因素，這就使得將來各民族彼此之間的協調融合容易多了。換言之，這個定義本身就含有國際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的動機在內。⁹至於「民族自決權」，這本小冊子也有詳細的說明：「自決權即是一個民族能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處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權按自治原則來安排本族生活。它有權去與其他民族建立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立出去。每個民族都有自主權，一切民族都是平權的。」¹⁰1903 年「民族自決權」正式被列入黨綱中，但事實上，民族自決理論的提倡是對民族主義一種策略性的讓步、是為了要推翻沙皇專政。藉著「民族自決權」，列寧鼓動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同大俄羅斯民族分離」，也就是要少數民族擺脫沙皇政權。

⁷ 陳振華，*蘇聯民族問題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 80 年)，頁 49-57。

⁸ 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頁 39。轉引自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初版一刷(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頁 481。

⁹ 尹慶耀，頁 481-482。

¹⁰ 史達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頁 41。轉引自尹慶耀，頁 482。

此外，對於當時俄國境內的民族問題，列寧另外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National-Territorial Autonomy)。他認為，「區域自治」不僅是解決中心與邊陲間殖民關係問題的方法之一，還是一種使大型多民族國家，如俄國，運作起來更富經濟效益的手段。不過，列寧所謂的「自治」是有限的；在各民族自治區域中，各民族可以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也可以派代表參與政治事務，但是，教育制度與內容、政府體制和傳播媒體等等必須是由中央的共產主義者所掌控。所以，列寧的「自治」是有限的。而且，自治區域的地理邊界，是由當地居民依照經濟、生活習慣等條件來決定，而不是依照民族的不同來劃分自治區域的邊界。¹¹

十月革命後，俄國邊區的民族在「民族自決權」及「區域自治」口號的激勵下，紛紛要求實現「民族獨立」的主張，並先後與外國簽訂軍事同盟、建立外交關係。面對此一情形，布爾什維克黨不再提倡「民族自決權」此一口號，改為採取蘇維埃式的聯邦體制架構來統治境內各民族。¹²列寧建立聯邦制的目的，事實上，是要使國家完全統一，而不是要發展各邦。1919年3月，列寧主持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有一段文字：「黨提出按蘇維埃方式組織的各國家，實行聯邦制的聯合，做為達成充分團結的過渡形式之一。」¹³這段文字中，「過渡」的字樣令人玩味。為了使各民族接受聯邦制，俄共吸收各民族的知識份子參加蘇維埃的工作，並讓他們擔任工業、農業和糧食等方面的職務，以期使他們逐漸蘇維埃化；另外，宣稱賦予各民族決定是否參加聯邦的自主權、將平等對待各民族並幫助落後民族的文化與經濟發展。¹⁴按照列寧的說法，蘇維埃式的聯邦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全歸於蘇維埃」。¹⁵階級制度的共產黨有嚴密的指揮控制系統，嚴格地實施

¹¹ 李玉珍，「蘇聯民族政策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23卷第7期（民國73年7月），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94。

¹² 陳治世，「論蘇聯民族政策」，*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14期（民國55年12月），台北：政治大學，頁226-227。

¹³ 「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黨綱摘錄」，*馬克斯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頁41。轉引自尹慶耀，頁485。

¹⁴ 李玉珍，頁96。

¹⁵ 陳治世，頁227。

黨內中央集權制：下級黨部必須服從上級黨部，各級黨部又必須服從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則必須完全聽命於黨領導人。共產黨利用其黨員控制各級蘇維埃，再利用各級蘇維埃控制已加入聯邦的邊區共和國。所以，在蘇維埃式的聯邦制度下，沒有分子國能真正擁有退出聯邦的權力。蘇聯所謂的「聯邦制」也僅僅是止於形式上而已。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成立，如列寧所願，實質上它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單一國家，而不是一個分權制的聯邦。

史達林出身格魯吉亞人，從小就備受大俄羅斯人的壓迫，對於民族問題有深刻的體驗。他指出，在沙皇體制下被壓迫的各民族，不能只求各自的民族自決運動，否則運動會被沙皇體制各個擊破，而革命政黨及工會也會因各民族的運動而被分離，削弱力量。所以，史達林得出的結論是：為了推翻沙皇，必須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結合。民族問題的解決，不是各民族的分離，而是各民族的無產階級集結成一個統一的革命政黨；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結合所有民族，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共同體。¹⁶雖然史達林在民族問題上的主張與列寧有異，但，在闡述他對民族問題的意見時，卻經常引用列寧的看法。史達林在1920年代時所寫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章，內容也認為蘇聯面臨到三個民族問題：一、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是1920年代初最嚴重的民族問題。二、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地方民族主義。史達林認為地方民族主義會轉變成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或是地方沙文主義。三、境內各民族與各地區的不平等。這些問題在俄羅斯帝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一直到蘇維埃聯邦制成立都沒有解決。其中「各民族與各地區的不平等」更是引起俄羅斯帝國時代所有民族問題的關鍵，因此，除了在法律上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外，史達林還主張在中央的行政、立法機關應該有各民族的共產黨員代表出席，這樣各民族便會視蘇聯（USSR）為自己的國家。此外，蘇聯政府還應透過「本地化」（indigenization/ *Korenizatsiia*）來

¹⁶ 楊默夫，*紅色綱人—史大林*，初版（台北：克寧出版社，1991年），頁54。

促進俄羅斯民族與非俄羅斯民族地區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上的平衡。¹⁷

1920 年代，蘇聯政府鼓勵境內非俄羅斯族文化的提升。因為在許多非俄羅斯人的地區，對共產政權的支持幾乎僅限於當地俄羅斯人。而在邊境地區若是想要建立長期的蘇維埃政權，是不可能只靠當地俄羅斯人的支持，因此，為了能保持革命的成果與國家的延續，就必須去說服與追求當地人民的忠誠歸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蘇聯中央鼓勵發展各民族的語言與教育、鼓勵各族文化的提升，還讓當地的菁英代表進入共和國的領導階層、黨的領導階層、甚至國家的領導階層等等。這種種「本地化」政策的手段，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政權能獲得非俄羅斯人的支持以及能在非俄羅斯人的地區生根。但是，「本地化」政策很明顯地不利於當地的俄羅斯人，使這些俄羅斯人成為黨民族政策的犧牲者。居住在其他各民族領域內的俄羅斯人都遭受到強大的壓力，被迫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就連當地的俄羅斯官員也包括在內。一些加盟共和國，如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甚至規定亞美尼亞語和喬治亞語為「國語」。在「本地化」政策之下，長久以來受到壓迫的非俄羅斯族不再感到絕望，感到絕望的轉變成是居住在當地的俄羅斯人了。¹⁸

1930 年代，史達林對民族問題的態度開始轉變。因為追求境內各民族平等的「本地化」政策，本來是用來解決民族問題的，但是，到了 1930 年代早期，卻反而造成了民族問題，威脅到蘇聯內部的團結。為了打擊地方民族主義，史達林一方面出動紅軍武力，另一方面則清算各共和國內非俄羅斯族的政治菁英。政治菁英的清算在 1937 年到 38 年的「大整肅」中（the Great Purges）達到高潮。至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自 1938 年起，又在史達林的民族政策中再度出現。1938 年 3 月，蘇聯通過一項法令，整個蘇聯境內的所有學校，都須將俄文定為必修科目。這項法令對俄羅斯人來說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因為他們早就以俄文來學習，俄文成為全蘇聯各個民族間溝通所使用的語言。¹⁹依瓦爾特 科拉茲（Walter Kolarz）的見解，這個語言政策實

¹⁷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pp.70-72.

¹⁸ *Ibid.*, pp.72-74.

¹⁹ Paul Kolstoe, p.85.

行的目的在於：一方面減少各地方語言與俄語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使同一語系中的各族方言逐漸衰弱，這樣一來，除了大斯拉夫主義之外，其他各種族的「大主義」(Pan-isms)便無由產生了。²⁰

史達林第一、二期五年計畫的實行帶來了工業化的衝擊，引起了新的一波俄羅斯人移民到邊境地區。各民族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數量逐漸增多，凡俄羅斯人所到之處，俄語的學校便成立，俄文的報紙以及其他設施也都隨之建立，以迎合這些俄羅斯人文化上的需要。由此就可看出俄羅斯移民與其他民族的移民有所區別，因為其他民族在移民之後並沒有此類相關設備的提供。非俄羅斯民族必須選擇上俄語學校或是選擇上當地民族語言的學校，絕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對前途有利的俄語學校。²¹ 這樣的選擇結果使非俄羅斯族人受到了語言上的俄羅斯化，也因此更進一步地加強了非俄羅斯人的俄化程度。除了在某些地區，例如，在波羅的海地區，俄羅斯人多半是藍領階級的工人以及車床工業的工人之外，一般說來，1930年代的境外俄羅斯人比居住在俄羅斯本身境內的俄羅斯人及其所居住的各民族共和國當地人民，具有較高的專業成就、生活水準與教育。²²

參、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時期

史達林之後，赫魯雪夫在民族政策上放棄了一些史達林的作法，如集中制、強迫俄羅斯化政策等。為奪得黨中央領導權，赫魯雪夫曾刻意討好偏遠共和國的黨幹部，使當地非俄羅斯族的一些黨領導人調升至莫斯科擔任要職，同時，也賦予各共和國在經濟行政和文化政策上有較大的自主權。²³ 但是，到了1958年中期以後，當赫魯雪夫的地位已告穩固，無須再取悅各共和國的黨部以爭取他們的支持時，他便緊縮這種較為自由的民族政策。赫魯雪夫聲稱，在他的領導之下，社會主義已經成功地改變蘇聯一些不同民族團體的意識，從民族意識轉向了社會主義意識，而正邁向共產主義意識，民族

²⁰ Walter Kolarz, p.18.

²¹ Paul Kolstoe, pp.82-83.

²² *Ibid.*, p.85.

²³ Yaroslav Bilinsky,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1967), p.17.

的差異已沒有存在的理由。²⁴ 因此，赫魯雪夫希望經由文化與社會經濟的改變來達成民族差異消失的目標。在文化方面，他認為俄語的普遍使用將可導致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的消失。在社會經濟方面，增加移民的比率和經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城市化將可使社會結構改變，快速地產生新社區，在這些新社區中，民族差異將無足輕重。²⁵

語言同化政策不僅在史達林時代進行，赫魯雪夫也同樣採取這種政策。1958 年蘇聯實施一項教育改革計畫。該計畫在原則上要求非俄羅斯地區的學校教授三種文字：當地語文、俄文、和外國文（英文、法文或德文中的一種），家長可以決定送自己的孩子進入使用本地語文教學的學校，或者進入使用俄文教學的學校。這項改革表面上是比以前的規定放寬了，家長也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且按照蘇聯官方的解釋，這樣的政策可以使所有學生都享有平等機會。²⁶ 但是，為了要使孩子有較好的前途，大多數的人還是將孩子送進俄文學校就讀，因此各少數民族的語文依然像從前一樣地逐漸荒廢。由於赫魯雪夫教育文化政策的推行，在 1958 年時，俄羅斯人僅佔蘇聯人口的 54.8%，但是，同年出版的新書中，俄文的竟然佔了 71%，其他文字的只有 29%，而新聞性質的刊物中，非俄文的刊物所佔的百分率則更低。²⁷

蘇俄所進行的蘇維埃化（Sovietization），除實行武力征服、語言同化等政策之外，經濟計畫也是一項主要手段。自 1928 年以來，蘇聯中央政府便計畫指導控制國內一切經濟活動。五年期的經濟計畫，接二連三地推行，一方面實行農業集體化措施，一方面實行大規模的工業集體化，一步步擴大中央政府的經濟控制，左右各地區的經濟命脈，消除各地區的民族經濟特性。這種集中和控制，曾經激發邊區的反抗和仇恨。赫魯雪夫曾坦白承認：「對我們而言，貿易的價值不在於達成經濟目的，而在於達成政治目的。」²⁸ 1957

²⁴ Jeremy R. Azrael e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 p.51.

²⁵ Ibid, p.54.

²⁶ Paul Kolstoe, p.87.

²⁷ 陳治世，頁 240-241。

²⁸ 呂律，*蘇聯經濟研究*，(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中華民國 63 年 5 月)，頁 47。轉引自黃榮河，*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與實踐*，(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國 78 年 6 月)，頁 159。

年，赫魯雪夫進行經濟管理計畫大改革，將全國分為一〇四個經濟行政區，每區設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Sovnarkhozy），增加中央對各地區的控制。赫魯雪夫經濟區的劃分，並不考慮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或民族區的疆界；電力糧食分配站的設置，不問種族的習慣或生活方式；工業、金融和交通運輸事業全部禁止民營，一切經濟資源收歸國有，全部置於國家計畫局的管制之下；全國經濟已納入一幅錯綜複雜的鐵網裡，沒有任何民族地區能保留足夠的條件以維持一個完整的經濟單位。1961年第22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個新的黨綱，聲稱「蘇聯境內各共和國之間的界線已失去其意義了。」²⁹ 莫斯科中央發出這樣的宣告，使居住在各民族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在政治上更不覺得他們是處在俄羅斯境外了。³⁰

為了解決國內長期以來食物短缺的問題，赫魯雪夫選擇外延成長的方式以取代內延密集成長的解決辦法。他決定開發西西伯利亞與北哈薩克的處女地來進行耕種。因此，西伯利亞與哈薩克（Kazakhstan）經歷了一大群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移入的移民潮。在蘇聯的歷史上，有幾次移民潮的發生：第一次移民潮發生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早期，伴隨著工業化活動的發生，各民族共和國中的工業幾乎都是由俄羅斯人所建立的。第二次移民潮發生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蘇聯遭受到重大的挫敗，超過三百個大型的工業企業（佔蘇聯工業總數的20%）東移，主要是遷移到哈薩克與中亞；當戰爭結束之後，許多當時跟著這些工業一起遷移的俄羅斯人便永久地留在當地。第三次移民潮發生在1940年代中期，一些在戰爭期間在政治上表現得不穩定的民族，如車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卡爾梅克人（Kalmyks）、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s）等等，被史達林放逐到克里米亞（Crimea）與高加索山區（Caucasus）。雖然在赫魯雪夫的統治之下，一些被放逐的人民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但許多俄羅斯的移民則留了下來，在這些地方成為少數民族。而第四次移民潮的發生，就是源起於赫魯

²⁹ Paul Kolstoe, p.91.

³⁰ *Ibid.*, p.91.

雪夫開發哈薩克境內處女地的運動。1959 年到 70 年這段期間，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數從四百萬人成長到五百五十萬人。此外，還有許多俄羅斯人移民到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且此處俄羅斯人的比率穩定地成長。1959 年居住在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佔總人口的 25.5%，1989 年提高到 34%，而愛沙尼亞則是從 20.1% 提高到 30.4%。³¹

表 2-1 蘇聯各共和國內本地人 (indigenous) 與俄羅斯人(Russians)組成的比例

	本地人口百分比				俄羅斯人口百分比			
	1959	1970	1979	1989	1959	1970	1979	1989
烏克蘭	76.8	74.9	73.6	72.7	16.9	19.4	21.1	22.1
白俄羅斯	81.0	81.0	79.4	77.8	8.2	10.4	11.9	13.2
摩達維亞	65.4	64.6	63.9	64.5	12.2	11.6	12.8	13.0
喬治亞	64.3	66.8	68.8	70.1	10.1	8.5	7.4	6.3
亞塞拜然	67.5	73.8	78.1	83.3	13.6	10.0	7.9	5.0
亞美尼亞	88.0	88.6	89.7	93.3	3.2	2.7	2.3	1.6
哈薩克	30.0	32.6	36.0	39.7	42.7	42.4	40.4	40.8
烏茲別克	62.2	65.5	68.7	71.4	13.5	12.5	10.8	8.3
克魯吉亞	40.5	43.8	47.9	52.4	30.2	29.2	25.9	21.5
塔吉克斯坦	53.1	56.2	58.8	62.3	13.3	11.9	10.4	7.6
拉脫維亞	62.0	56.8	53.7	52.0	26.6	29.8	32.8	34.0
立陶宛	79.3	80.1	80.0	79.6	8.5	8.6	8.9	9.4
愛沙尼亞	74.6	68.2	64.7	61.5	20.1	24.7	27.9	30.4

資料來源：Edited by Vladimir Shlapentokh, Munir Sendich & Emil Payin,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M. E. Sharpe, Inc., 1994), p.15.

一般說來，移民到中亞的俄羅斯人大部分是技術工人、技術師和工程師。除了這些技術性的工人之外，也有非技術性的工人。非技術性的工人是由以往的農民轉業而來，他們依靠的只是他們的體力和忍耐力，因此他們大多從事苦力的工作和危險的工作。被送到哈薩克去開發處女地的人大部分都

³¹ V. Shlapentokh ed., p.14.

是非技術人員、城市的無業遊民以及沒有多少技能可以換取更好生活的低薪工人。³² 居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俄羅斯移民也一樣，傾向於從事苦力的工作、礦工或是在建築工地工作。這些俄羅斯人的教育與文化層級通常遠低於當地的民族。當移入人口的文化與技術層級越低，就越難適應與融入較為發達的當地社會之中，而且移入人口會有越大的渴望想要孤立他們自己並建立一個封閉的社區。雖然這樣的表現在事實上是一種卑微情緒的體現，但，這樣的行為卻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種民族優越感的外貌，尤其是當這移入人口所屬的民族是這個國家的領導民族時，這種情形更容易出現。而波羅的海地區大部分的俄羅斯移民正是這種例子的典型代表。³³ 除了較下階層的工人之外，移民到各民族領土上的俄羅斯人還有：一、共產黨員、執行政府計畫的官方領導人與國家金融團體、工業行政管理的人員；二、蘇聯軍隊與這些軍人的家屬；三、知識份子等。

1964年，布里茲涅夫執政，仍然繼續推行赫魯雪夫的民族政策。1971年，蘇聯當局在第二十四屆蘇共代表大會發表一項理論性聲明，號稱一個新的「蘇維埃民族」(Soviet Nationality)已經誕生。所謂的「蘇維埃民族」，就是分享共同疆域、共同的國家、共同的經濟體制、共同文化、共同締造共產主義與共通語言(俄羅斯語)為目標的人類新社會。³⁴1974年6月14日，布里茲涅夫也宣稱：「我們現在已經形成了歷史性的統一新人——「蘇維埃人」(Soviet People)，這就是說，蘇聯人現在已不受社會差別與民族差別的限制，而愈來愈明顯地具備共同的行為、性質與宇宙的特點。」³⁵但事實上，「新蘇維埃人」不但沒有在邊區誕生，就連在俄羅斯境內也未見成長。那些遷移到各民族領土的俄羅斯人在當地的人群中不僅發現到他們說的語言與當地人不同，連文化環境也不相似。雖然經過俄共多年的同化政策，各個民族的

³² *Ibid.*, p.15.

³³ *Ibid.*, p.16.

³⁴ Lubomyr Hajda 著，吳之敏譯，「戈巴契夫面臨民族問題」，*東方雜誌*，復刊第22卷第7期(民國78年1月1日)，頁61。

³⁵ 蘇俄報刊輯要，「一切都是為了蘇聯人民的幸福」，第113期(民國64年2月)，頁14。轉引自胡漢平，*列寧主義民族問題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國78年)，頁108。

生活方式並沒有完全地統一，因為即使是採用最激烈的強迫手段，也無法使好幾世紀流傳下來的舊文明在一夕之間被消除。在邊區大多數人的心靈深處，依然潛存著一種反抗的獨立意識，其改變僅限表面上的，只求達到滿足統治者的程度，並不是一種深入內部的改變。³⁶

第二節 一九四〇年以前波海三國與蘇聯的關係

壹、中古世紀以前

早在西元前三千年，立陶宛的祖先就從俄羅斯的中部越過伏爾加地區來到波羅的海。而自黑暗時代起，因為貿易、傳教以及軍隊遠征等等因素，一些俄羅斯人在今日的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地區殖民，不過，為數並不多。

早期波羅的海地區依賴俄國基輔和諾夫哥羅德親王的保護。但是，俄羅斯親王對此地區的政治控制權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13世紀初，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因為宗教的因素入侵波羅的海地區並且成功地將俄國勢力逐退，佔領此區。被強迫信仰基督教的愛沙尼亞人與拉脫維亞人在尚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政治體制時，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社會與文化體制所併吞了。侵略者開始在此地殖民、為此地的人民施洗並且將奴隸制度強加在此地的居民身上，當地居民對自身族群的認同感逐漸減弱，一直到近代民族主義復興時期，才開始他們民族意識的覺醒。³⁷

當條頓騎士團佔領立瓦尼亞（Livonia）³⁸時，善於航海的丹麥人盤據在愛沙尼亞的北部。1343年到1345年之間，愛沙尼亞人群起反抗日耳曼貴族與丹麥貴族的統治，迫使丹麥將北愛沙尼亞的控制權交給日耳曼人，愛沙尼

³⁶ 陳治世，頁 241-242； V. Shlapentokh ed., pp.14.

³⁷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

³⁸ 立瓦尼亞（Livonia），今愛沙尼亞中、南部和拉脫維亞北部。

亞人遂全部成為日耳曼貴族統治下的奴隸。³⁹ 當地人民反異族統治的起義被鎮壓之後，這個地區平靜了將近兩個世紀，幾個大中心城鎮，如塔林（Tallinn）塔圖（Tartu）里加（Riga）等城市，因為加入了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所以使得此區商業快速地發展，也與俄羅斯建立了密切的經濟關係。原本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俄羅斯交界的東部邊境上就已經有一些俄羅斯的農民居住，到了16世紀，因為立瓦尼亞與俄羅斯經濟往來的關係，這些邊境地區出現了愛沙尼亞人與俄羅斯人混合居住的城市，一些俄國商人更是在立瓦尼亞的城市中永久定居。

在這幾個世紀中，立陶宛開創了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不同的命運。1248年，立陶宛在當地首領明道加斯大公（The Grand Duke Mindaugas）的領導下，成功地抵禦了條頓騎士團的侵略。此時期的立陶宛不但擁有足夠的力量抵抗外來的攻擊，繼任的大公還將立陶宛的勢力擴展到白俄羅斯（Belorussia）、俄國的基輔（Kiev）與斯摩稜斯克（Smolensk）一帶。⁴⁰ 到了14世紀末，立陶宛人已經建立起一個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海岸的立陶宛公國，今天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地均在其領域之中。立陶宛公國所統治的人口，有四分之三均為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人，在立陶宛的上層社會中，東正教亦為主要的信仰。⁴¹ 由於俄國語言與文化的傳播，好戰的立陶宛人採用了俄國的訓練與組織技巧，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成為東歐的強權之一，而且在機構、語言與文化上越來越俄國化。⁴²

這種俄羅斯文化深深影響立陶宛公國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386年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立陶宛大公亞格洛（Jagiello，1377-1434）為了政治上的野心，與波蘭年輕的女王雅德維加（Jadwiga）結婚，並立即接受羅馬天主教

³⁹ Walter R. Iwaskiw ed.,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Country Studies*,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6), p.12.

⁴⁰ John Hiden & Partick Salmon, *The Baltic Nations and Europe—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gman, 1996), p.12.

⁴¹ Walter R. Iwaskiw ed., p.178.；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初版九刷（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發行，民國84年），頁69至70。

⁴² 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初版（國立編譯館，民國84年），頁144、146。

為其信仰，還宣布立陶宛為一天主教國家，進而更兼任波蘭國王。⁴³ 從此開始，一直到 18 世紀立陶宛被俄羅斯帝國兼併為止，波蘭文化開始逐漸影響立陶宛，甚至，連波蘭的興衰也連帶影響了立陶宛命運的起伏。

中世紀波羅的海地區的俄國人多是一些來自諾夫哥羅德 (Novgorod) 和皮茲科夫 (Pskov) 的商人，他們與一些斯拉夫人或是一些斯拉夫化的波羅的海人 (Slavicised Balt) 居住在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的東部。此外，13 到 15 世紀之間，在立陶宛的統治之下也有數目龐大的俄羅斯東正教人民。⁴⁴

貳、中古世紀到十九世紀

從 16 世紀開始，莫斯科公國的戰鬥力逐漸增強，而日耳曼人的戰鬥力反而日漸衰退。伊凡四世 (Ivan IV, the Terrible) 為了促進國內建設，屢向西方延聘軍事及工程技術專家東來協助，並擬與西歐國家發展貿易關係。立瓦尼亞、波蘭與瑞典等國家擔心俄國實力大增，禁止技術人員與商人到莫斯科，這些國家的阻撓形成了一道隔絕歐、俄接觸的柵欄。1550 年代後期，沙皇政府內部討論外交上的優先順序，提出的意見中，一派主張俄羅斯應對西方保持謹慎，另一派主張伊凡四世應親自領軍征服克里米亞，但是，伊凡四世本身卻想要進攻立瓦尼亞，因為它軍事薄弱、有土地可兼併以及波羅的海對俄羅斯的貿易頗為重要。⁴⁵ 1558 年 1 月，伊凡四世帶領著四萬大軍入侵立瓦尼亞，開啟了長達二十五年的立瓦尼亞戰爭 (1558-83)，此時條頓騎士團的武力已無法與俄國的軍力相抗衡，俄羅斯幾乎完全佔領此區，但是，丹麥、瑞典與波蘭三國也入侵立瓦尼亞並與俄羅斯一同競爭這個地區的控制權，不僅阻擋了俄國佔領此區還迫使伊凡四世東退至佩普西湖 (Lake Peipsi) 後。1629 年，瑞典贏得了道加瓦河 (Daugava River, 今拉脫維亞境內) 以北的全部土地。⁴⁶ 在瑞典的統治之下，日耳曼籍的貴族仍然保有其地位，甚

⁴³ 呂岳憲，*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運動之研究—由國際法理論探討*，(台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民國 83 年)，頁 12。

⁴⁴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81.

⁴⁵ 李邁先，頁 100-101；蔡百銓譯，頁 216-217。

⁴⁶ Toivo U. Raun, *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25-28.

至，瑞典政府為了換取貴族的效忠賦予他們更多的特權。

很難確定到底在 18 世紀以前這個地區有多少的俄羅斯人存在。從 14 世紀起就出現在佩普西湖西岸的俄羅斯村莊一直都有俄國商人居住。立瓦尼亞戰爭時，此區俄國人的數目減少了很多，但是，從瑞典統治到將近 17 世紀末的這段期間，俄國人的數目又開始不斷增加。根據 17 世紀瑞典官方的記載指出，在愛沙尼亞的西部有數十個以俄文為名的村莊，而在佩普西湖沿岸的居民中，俄羅斯人佔了四分之一，不過，在總人口數中俄羅斯人的比例還是少於 1%。⁴⁷

1569 年，立陶宛與波蘭合併成一個「波蘭—立陶宛國協」(Polish-Lithuania Commonwealth)，「波蘭—立陶宛國協」持續了 226 年，一直到 1795 年，俄、普、奧三國第三次瓜分波蘭為止。在這段期間內，波蘭的貴族與教會支配著立陶宛的政治菁英，不但忽視立陶宛的語言，還將波蘭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引進立陶宛。無論是在文化、政治或是宗教等各方面，這段時期的立陶宛可說是完全地「波蘭化」了。⁴⁸

16 世紀波羅的海地區俄羅斯人的村莊陸續有俄羅斯人加入。這些人是在俄國遭受到恐怖伊凡及其後繼者迫害的政治難民與宗教異議份子。其中為數最多的是「舊信仰者」(“ Old Believers ”)，這些俄羅斯東正教的信徒拒絕接受 17 世紀沙皇所進行的教會儀式改革而逃離俄國來到波羅的海地區。除了在佩普西湖沿岸有他們的村莊外，在立陶宛也有他們聚集的村落。⁴⁹

17 世紀末，瑞典在波羅的海地區的霸權地位遭到俄國覬覦。由於俄國本身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周圍敵邦環伺，使俄國顯得十分孤立，彼得大帝展開俄國推進運動就是為了要打破這種束縛，以便取得海港並與西歐進行商業和文化的直接接觸。1700 年到 1721 年大北方戰爭 (The Great Northern War) 俄國擊敗瑞典，雙方簽訂奈斯塔德條約 (Treaty of Nystadt)⁵⁰ 結束了瑞典在此

⁴⁷ “Russian Communities in Estonia”, http://www.einst.ee/society/russian_communiti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⁴⁸ Walter R. Iwaskiw ed., p.178. ; 呂岳憲，頁 12-13。

⁴⁹ Anatol Lieven, pp.181-182.

⁵⁰ 奈斯塔德條約重要內容如下：(一) 瑞典將愛沙尼亞、立瓦尼亞、印格里亞及芬蘭南方卡累阿之

地的統治權。在取代了瑞典的北歐霸權地位後，俄國找尋通往海上航路港口的願望終於實現，不僅獲得了一大片波羅的海地區的土地，還在芬蘭灣建立了一座港口，得到了「西進之窗」(“Window to the West”)。

大北方戰爭之後，俄國開始了她在波羅的海地區的長期統治。對於地方上的日耳曼貴族，沙皇政府仍然承認他們的特權，而社會上的菁英階層也依舊是由日耳曼的貴族、聖職人員和商人組成。⁵¹ 在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下，獨一無二的混合社會，在這裡產生：波羅的海的日耳曼人支配著經濟、文化、社會及地方政治，而俄羅斯的官僚則掌控高層的政治與行政。一直到 19 世紀末以前，這裡都沒有發生大規模的俄化，無論是在法令、自治體制或是教育上，都與俄羅斯有很大的不同，這個地區就像是俄羅斯帝國中一個分離的部分。⁵²

由於一些俄羅斯的官員、士兵與商人隨著彼得大帝的征服來到了波羅的海地區，使這裡的俄羅斯人逐漸增多。⁵³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只是短暫停留，只有少數的人在這裡紮根，所以，在人口的組成上並沒有多大的影響，而俄羅斯人的數目也沒有多大的增加。

俄羅斯帝國對於位在南部的「波蘭—立陶宛國協」一直設法併吞。凱薩琳二世 (Catherine II, 1762-96) 時，俄國、奧國與普魯士分別在 1772 年、1793 年以及 1795 年三次瓜分波蘭。最後一次的瓜分終於使立陶宛落入俄羅斯帝國的統治。在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之下，立陶宛已不是一個國家而是被劃分為數個省分，從此，「立陶宛」這個名字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消失了一百二十三年。

19 世紀的俄化政策結束了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德國貴族的特權地

一部，包括維堡 (Viborg) 在內，一律割予俄國；(二) 波羅的海東部若干小島，如奧索 (Oesel)、達戈 (Dagoe) 等地由俄國佔領；(三) 俄國將原已於一七一四年佔領之芬蘭，退還瑞典，並給予瑞典相當之賠償；(四) 俄國保證今後不再干涉瑞典之內政，尤其對於查裡逝世後之王位繼承問題不再過問。李邁先，*俄國史* (上卷)，頁 145。

⁵¹ Toivo U. Raun, 1991, p.37.

⁵² “Russian Communities in Estonia”, http://www.einst.ee/society/russian_communiti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⁵³ Anatol Lieven, p.182.

位。1881 年，俄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1881-94）即位，他一改前任沙皇的作風，下令禁止所有的德式路德教派教堂、法院、學校及法律，全部以俄國的行政官僚與制度取代。1885 年，為了配合持續增加的俄羅斯公務員，強迫規定俄語為官方語言，出版品也強迫以俄文為唯一使用的文字。此外，學校的教師若是不會說俄語，就會被解職，並從俄羅斯引進教師來取代他們。但是，事實上，一直到 19 世紀末，俄羅斯的東正教信仰與俄化的學校對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大，反而是經濟的發展對此地的影響較大。⁵⁴為了達成俄化的目的，帝俄政府大規模地將俄羅斯農民遷移到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不過，這種殖民計畫的成效還不如非計畫中移民的成效。由於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波羅的海地區出現了新的工廠和碼頭，這些新的工作機會吸引了上萬名貧困的俄羅斯農夫自願到波羅的海工作。

依據 1867 年的人口統計，有 8500 名以上的俄國人住在愛沙尼亞。1881 年俄羅斯人的數目增為 1 萬 6 千名，約佔愛沙尼亞總人口數中的 2%。⁵⁵而拉脫維亞的里加，在 1897 年時躍升為俄羅斯帝國的第六大城。

在立陶宛，俄化運動不但比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早發生，沙皇政府在這裡實施的手段也是三國中最為激烈的。受到長達近三百年波蘭文化的薰陶，立陶宛已發展出與俄羅斯迥異的文化、宗教與政治系統，而且，立陶宛不像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有資本主義新工業的發展，其經濟的重心仍舊在農業上。從 1865 年到 1904 年為止，所有立陶宛語（以拉丁字母拼成）的出版品一律被禁止，只能使用以斯拉夫字母（Cyrillic）拼成的俄文。沙皇政府鼓勵東正教教堂發展以改變當地羅馬天主教的信仰，俄國的教育體系也強加在此地實行。許多俄羅斯人按照俄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從俄羅斯移民到立陶宛。農村中反俄的情緒助長了立陶宛人逃離家鄉的移民潮。絕大部分的立陶宛人移

⁵⁴ Edward C. Thaden ed., *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1855-191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7.

⁵⁵ “Russian Communities in Estonia”, http://www.einst.ee/society/russian_communiti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居到美國和加拿大。根據統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每三個立陶宛人中就有一個是住在北美洲。⁵⁶

參、二十世紀以後

1905 年的俄國革命對整個波羅的海地區都造成了影響，不過，三國的影響層面各有不同。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對俄羅斯政府的抗議多為社會政治層面，而立陶宛則多在文化層面。⁵⁷

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趁著俄國發生革命，在政治上要求自治以及停止俄化政策。1906 年以後，愛沙尼亞的代表獲得了參加國家杜瑪會議（Duma）的權利，並不斷地企圖推翻俄化政策，例如，要求愛沙尼亞語可以在地方政府與地方法庭使用。不過一直到沙皇政權結束為止，波海地區的政治與管理機構在本質上被俄化的情形都沒有改變。⁵⁸ 在拉脫維亞，不僅工人罷工，許多農民也起義並燃燒封建莊園的房舍，結果俄羅斯當局嚴重懲罰暴亂的人們，不但射傷了三千多人，還將許多人遣送到西伯利亞。1905 年的抗爭雖然失敗了，但是，拉脫維亞首次提出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要求。⁵⁹ 在立陶宛，抗爭活動多限於在鄉村地區，而且目標都是在攻擊俄羅斯學校的老師以及東正教會中的聖職人員。1905 年 12 月兩千名來自立陶宛各地的代表在維爾紐斯（Vilnius）集會，與會代表一致形成尋求自治以及在行政管理機構使用立陶宛文的共識。雖然立陶宛的革命最後沒有成功，但是，限制立陶宛語的禁令被解除，學校也陸續地以母語教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帶給了三國獨立的機會。1917 年愛沙尼亞人在彼得格勒發動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遊行，這次的運動使愛沙尼亞成為帝俄統治下第一個獲得自治權的省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人的數目不斷持續增加。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許多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被派到前線作戰。1918 年 2 月 24 日，愛沙尼亞宣布獨立，俄

⁵⁶ Paul Kolstoe, p.7.

⁵⁷ *Ibid.*, pp.7-8.

⁵⁸ Edward C ed., Thaden, p.313.

⁵⁹ 呂岳憲，頁 35。

羅斯一些行政管理機構自愛沙尼亞撤回俄國。接著德國軍隊入侵佔領愛沙尼亞，直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宣布戰敗為止。留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對德國人與愛沙尼亞人懷有恐懼，在德國佔領愛沙尼亞的十個月中，陸續又有更多的俄國人移出。⁶⁰ 之後蘇聯紅軍入侵愛沙尼亞，嚴重威脅到愛沙尼亞的地位，不過，幸而在 1919 年 1 月芬蘭自願軍、英國海軍及德國國民兵的協助之下，逐步地將其擊退。在宣布主權獨立之後，愛沙尼亞還繼續戰鬥了兩年才獲得真正完全地獨立。1920 年 2 月 2 日，蘇聯與愛沙尼亞在塔圖簽訂和平條約，雙方除了允諾互不侵犯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外，蘇聯還在此約中正式承認愛沙尼亞的獨立地位並同意愛沙尼亞為永久中立國。1921 年 1 月起，西方各國陸續給愛沙尼亞法律承認，9 月，愛沙尼亞加入國際聯盟。

雖然，拉脫維亞於 1918 年 11 月 18 日宣布了主權獨立，但是這裡的情勢遠較愛沙尼亞複雜。由於俄羅斯帝國有許多工業城鎮位在拉脫維亞境內，吸引了來自拉脫維亞鄉下以及俄羅斯內地的工人來這裡工作，並且因為受到 1905 年俄國革命的影響，拉脫維亞發展出了有力的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斯主義也在此地開始傳播。根據 1913 年的人口調查，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有 20 % 的俄國人居住。⁶¹ 1915 年，德國入侵拉脫維亞，俄羅斯工人與波人一樣都視德國貴族為敵人，因此，他們與德國貴族之間的關係有點緊張。接著俄國自拉脫維亞撤軍，也連帶使工廠和工人撤退，使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人數量大減。拉脫維亞人力短缺，只好以波蘭人和立陶宛人來補充。俄國政府為了阻止德軍在此得勢，成立了一支步槍隊，這支軍隊是由拉脫維亞人和一些留在拉脫維亞的俄羅斯軍人所組織而成。這些人一方面支持拉脫維亞的民族運動，另一方面也支持布爾什維克黨。所以，當 1919 年蘇聯紅軍侵略拉脫維亞時，某些人竟支持紅軍的入侵，相較之下，拉脫維亞民族主義者只好接受德國與俄羅斯貴族（White Russians）的幫助，但是，無論是德國

⁶⁰ “Russian Communities in Estonia”, http://www.einst.ee/society/russian_communiti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⁶¹ Anatol Lieven, p.182.

人或是俄羅斯貴族，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要在拉脫維亞成立傀儡政府。最後，在愛沙尼亞的援助之下，與拉脫維亞的軍隊共同合作將德國人、俄羅斯貴族以及蘇聯紅軍擊退出拉脫維亞。⁶² 1920年8月11日，蘇聯與拉脫維亞在里加簽訂和平條約，承認拉脫維亞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1921年9月22日，與立陶宛一同獲准加入國際聯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的時候，德國就立刻佔領了立陶宛，不過，雖然德軍控制著整個立陶宛，立陶宛還是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撤出立陶宛，外國的勢力隨即競相侵入這個軍事真空地帶。1918年蘇聯紅軍入侵立陶宛，但被立陶宛國民軍（the Lithuanian National Army）擊退。1920年7月12日，蘇聯與立陶宛在莫斯科簽署一項和平協定，協定中俄方除允諾不干涉立陶宛內政外，還承認立陶宛為一獨立國家。當紅軍才將維爾紐斯交還給立陶宛後不久，波蘭又將維爾紐斯併吞，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歸還。由於波蘭的非法侵佔立陶宛首都，所以立陶宛直到1938年才和波蘭建立外交關係。1922年7月28日美國承認立陶宛之後，西方國家也相繼地給予立陶宛承認。

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波海三國也得到了獨立，當初「舊信仰者」的移民模式再度發生。俄國的難民逃到波海三國尋求庇護，其中有許多人是因為宗教的因素而離開家園，如，在立陶宛東南部的一些東正教社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一批受過教育的新俄羅斯移民是由許多不同族群所組成，像在拉脫維亞，就有許多是說俄語的猶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里加是次於巴黎的第二大俄羅斯移民地。移民到波海三國的俄羅斯人雖然抱怨當地新聞記者和政客所使用反俄的言詞，以及在教育上受到差別待遇，不過，由於共黨的發展，使波海三國的俄羅斯人獲得了許多保護。⁶³

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之後，與蘇聯保持冷漠的關係。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是外交方面均以西歐為導向。在政治上，受到當時西方政治潮流的影響，

⁶² Walter C. Clemen, Jr., pp.33-34.

⁶³ Anatol Lieven, p.182.

三國皆制訂並通過自由民主的憲法，不過，由於三國尚未發展出適當的社會結構、經濟體制、政治文化和傳統來作為支持自由民主政治體制運作的必要因素，因此在經歷過一段政治不穩定、政府更迭頻繁的時期之後，三國的政治型態便逐漸轉變成威權主義的體制。⁶⁴

在經濟方面，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現代工業發展始自 19 世紀後半，其產品出口以俄國為主要市場，而且本區港口冬季多不結冰，是俄國對西歐貿易的主要商港。立陶宛的經濟主要以農業為主，主要製造供應俄國市場的食品和消費品。根據統計，1930 年時，愛沙尼亞的勞動力有 17.4% 是投注在製造業上、拉脫維亞是 13.5%，而大部分仍保持未工業化的立陶宛只有 6% 的勞動力是用在製造業上。⁶⁵ 波海三國獨立之後，失去俄國市場，產品便轉以西歐為銷售對象，其中英國與德國是這段時期三國最主要的兩大出口市場。

在社會文化方面，三國開始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並獲得很大的進展。不僅學校數目增加，還設立了國立的大學，並且首次在高等教育中可以使用本國的語言。此外，雖然波海三國本身的民族文化蓬勃發展，但是對於少數族群的文化自治，當地政府是給予相當的尊重。例如，1925 年，愛沙尼亞國會通過少數族群文化自治法案（the Cultural Autonomy of Ethnic Minorities Act）確保了愛沙尼亞境內所有族群得以保持他們自己的族群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甚至，在 1920 年所成立的一個俄羅斯人的社團——俄羅斯民族聯盟（the Russian National Union）在愛沙尼亞國會也有代表出席。⁶⁶ 1938 年 6 月 18 日到 19 日，愛沙尼亞的那爾瓦城（Narva）舉行「俄羅斯文化節」（Day of Russian Culture）的慶祝活動，（當時該城的俄羅斯人已從大約佔 30% 的少數人口變為佔 94% 的主要人口）大祭司亞歷山大

⁶⁴ 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三年帕茨（Konstantin Päts）取得獨裁政權為止，愛沙尼亞總共經歷了二十三個政府。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也是分別在烏爾曼尼斯（Karlis Ulmanis）和斯梅托納（Antanas Smetona）取得獨裁政權之後才結束不穩定的政治狀態。Walter R. Iwaskiw ed., pp.16-17, 96-97, 180;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11.; Walter C. Clemen, Jr., p.50.

⁶⁵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11.

⁶⁶ “Russian Communities in Estonia”, http://www.einst.ee/society/russian_communiti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3 年 5 月 30 日

沙哈洛夫 (Alexander Sakharov) 致詞感謝愛沙尼亞政府讓俄羅斯人能居住在「和平與繁榮」之中，而且，根據俄羅斯移民學者 Temira Pachmuss 的說法，當時所有的演講者，包括愛沙尼亞的官員們，都以俄語演講。另外，同樣在那爾瓦舉行的俄羅斯歌唱節 (the Festival of Russian Song)，也吸引了來自愛沙尼亞各地數千民的歌者一同參加慶祝。⁶⁷

在外交政策上，波海三國企圖追求一個中立的路線，不過最終還是無法抵抗強權的侵略。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視德國為他們最大的威脅，而愛沙尼亞比起拉、立兩國來說，距離德國較遠，且 1924 年時，愛沙尼亞曾經受過共黨的突擊，當時共黨雖然沒有成功，卻使愛沙尼亞對蘇聯更加提防。⁶⁸ 1939 年 8 月 23 日納粹德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秘密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The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⁶⁹ 彼此協議劃分東歐及南歐的勢力範圍。條約簽訂後，波海三國被列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從此，蘇聯便展開積極的行動，處心積慮地想要兼併這個地區，最後，波海三國終於落入蘇聯的統治。

第三節 1940 年到 1985 年波海三國與蘇聯的關係

波海三國獨立的命運與「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息息相關。1939 年 8 月 23 日納粹德國與蘇聯在該條約所附加的秘密議定書中將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劃為蘇聯的勢力範圍，而立陶宛則歸入德國的勢力範圍。隨後由於波蘭在立陶宛的勢力瓦解，德國與蘇聯以一些土地做為交換條件⁷⁰再將立陶宛也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定以後，蘇聯積極展開侵略行動。1940 年 6 月蘇聯成功地佔領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

⁶⁷ Anatol Lieven, pp.182-183.

⁶⁸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14.; Walter C. Clemen, Jr., p.50.

⁶⁹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The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又稱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⁷⁰ Walter C. Clemen, Jr., p.51.

併吞波海三國之後，蘇維埃化的行動隨之展開。在政治方面，共產黨成為各國境內唯一的政黨，其黨員也急速地增加。其中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是來自於三國以外的蘇聯其他地區。這些進入波海三國的俄國人，不但是在量上，而且在質上也很重要。俄羅斯人不僅躍升為三國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見表 2-2)，同時也佔據了許多重要的職務。不過，雖然共黨重要幹部都是由俄羅斯人擔任，蘇維埃政府的統治手法並沒有拙劣到指派俄國人擔任各共和國的內閣總理，或地方最高蘇維埃主席等一類的重要職務，甚至各國共產黨的第一書記，都是由該國的本國人充當。但，「很巧合地」，這三個國家的共黨副書記都是俄國人，而且黨裡還有許多責任很重、影響很大的職位，也都是由俄國人來擔任。相反地，波羅的海各國的共產黨人卻不能在莫斯科得到任何重要的職務。波羅的海各共和國被併吞之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共黨領袖們，無一能進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擔任中央委員，最多只能當到候補委員。⁷¹

在經濟方面，大批外來的蘇聯軍隊以及政治幹部即刻地影響到三國的日常經濟生活：需求增加，造成食物、日常用品甚至是住屋的短缺。產品的驟減使蘇聯恰好順勢進行經濟的蘇維埃化。工業被國家徵收，管理幹部被撤換，由一批沒有工業管理經驗但是卻擁有「適當」社會背景的人來接替，以方便政府完全的監督和控制。工人失去自組自治團體的權力，並被要求長時間工作，否則處以嚴厲的處份。史達林主義之下的勞工法，認為勞工必須為毀壞或因不小心造成的損失（由管理人來判斷）付出賠償。有時候懲罰的費用比實際上的損失要高出五倍。未經批准就離職的勞工會被處以二到四個月的監禁。對於拒絕調到他廠工作的人，也同樣會被判刑。⁷²自蘇維埃化的第一天開始，盧布就被視為合法貨幣，不公平的貨幣兌換率⁷³為來到此地的俄國人提供了高收入、低消費的額外利益。至於波海三國各國本身的通貨，在

⁷¹ Walter Kolarz, p.109.

⁷²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34.

⁷³ 在重訂貨幣兌換率之前，在愛沙尼亞，1kroon 值 10 到 15 盧布（當時大約 18kroon = 1 英鎊）。重訂之後，1kroon = 1.25 盧布。在拉脫維亞，1lat 值 10 盧布，重訂之後，1lat = 1 盧布。在立陶宛，之前 1litas 值 3 到 5 盧布，重訂之後，1litas = 0.9 盧布。Ibid., p.32.

1940 年未完全被廢除。

表 2-2 波海三國，1989 年各國境內主要民族的數量；1930 年代(註 a)、1959 年、1970 年 1979 年 1989 年各國主要民族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以及 1959 年-1989 年該比例的變化。

國 名 民族名	1989 年主要 民族數量(以 千人為單位)	主要民族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1959-1989 年主要民 族的比列 變化(%)
		1930 年代	1959 年	1970 年	1979 年	1989 年	
<u>愛沙尼亞</u>	1,566	(1934 年)a					
愛沙尼亞人	963	87.8	74.6	68.2	64.7	61.5	-13.1
俄羅斯人	475	8.2	20.1	24.7	27.9	30.3	+10.2
其他	127	4.0	5.3	7.1	7.4	8.2	+2.9
<u>拉脫維亞</u>	2,667	(1935 年)a					
拉脫維亞人	1,388	77.0	62.0	56.8	53.7	52.0	-10.0
俄羅斯人	906	8.8	26.6	29.8	32.8	34.0	+7.4
其他	373	14.2	11.4	13.4	13.5	14.0	+2.6
<u>立陶宛</u>	3,675	(1923 年)a					
立陶宛人	2,924	69.2	79.3	80.1	80.0	79.6	+0.3
俄羅斯人	344	2.5	8.5	8.6	8.9	9.4	+0.9
波蘭人	258	15.3	8.5	7.7	7.3	7.0	-1.5
其他	148	12.6	3.7	3.6	3.8	3.0	+0.3

註 a：1930 年代波海三國並不屬於蘇聯。愛沙尼亞 1934 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其調查的領土範圍與「愛沙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土範圍一樣；1935 年拉脫維亞人口普查的資料，其調查的領土範圍則是獨立共和國的範圍，與「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土範圍稍有不同；1923 年立陶宛的人口普查資料，則不包含維爾紐斯，當時維爾紐斯屬於波蘭。
資料來源：1.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7, pp.432-433. 2. Edited by Vladimir Shlapentokh, Munir Sendich & Emil Payin,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M. E. Sharpe, Inc., 1994, p.92-93. 3. Chauncy D. Harris, “The New Russian Minorities: A Statistical Overview”, *Post-Soviet Geography*, vol.34 no.1(1993),p.4.

在社會文化方面，所有私立學校都被國家接管，中、小學的學制也由立陶宛原本的十三年、拉脫維亞的十二年減少為與蘇聯相同的十一年，愛沙尼亞則因為原本就是十一年所以沒有改變。課程內容重新徹底校定，歷史被重寫，以宣揚俄羅斯帝國積極、進步與友好的形象。報紙、雜誌等大眾出版品無論是在內容或是在發行量上，都受到政府的管制。許多作家襟口不語、或是被殺害、被流放、被迫羞辱地向體制妥協。許多受過教育的波海人民在蘇聯入侵時逃亡到西方。這些知識份子的逃亡，對波海三國的社會結構而言是一大打擊，對波海的文化也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例如，1945 年時，愛沙尼亞塔圖大學戰前的教職員留在愛沙尼亞的已不超過 22%。⁷⁴在宗教方面，三國的宗教節慶都被廢除。教堂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1948 年時，只剩一位主教留在立陶宛，其餘的不是逃亡，就是被謀殺或流放。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主教也遭受到類似的命運。⁷⁵

在人口方面，極大數目的波海三國人民被蘇聯強迫流放到西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地區。1940 年末，一些零星的逮捕與流放開始，每個月大約有兩百到三百人被捕。1941 年 6 月 13 到 14 日晚間，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流放行動，超過 1 萬 2 千名的愛沙尼亞人、1 萬 5 千名的拉脫維亞人和 3 萬 4 千名的立陶宛人在一夜之間被迫流放。⁷⁶數以萬計的人被裝入卡車載走，許多人是在半夜被臨時告知必須要「移居到某地」，並且立刻打包行李離開。這些人被擠入窗戶悶死的車廂中，一車車地載往目的地。不少人在被「運送」的過程中死亡，到達目的地之後，又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因為飢餓和寒冷而失去生命。被流放的家庭遭到有計畫地拆散：男人被送到礦場或伐木場的勞工營；婦女和小孩則送到集體農場自食其力。被迫流放的大批人口，其命運注定將漸漸消失在西伯利亞，這種手段對任何一個族群來說都無異於是一種有計畫的屠殺滅種。在蘇聯第一年的統治之下因為流放、遷移、屠殺以及毫無預警的消失等各種因素所減少的人口，在愛沙尼亞大約有 6 萬人（因為在愛

⁷⁴ Anatol Lieven, p.92.

⁷⁵ *Ibid.*, p.92.

⁷⁶ Walter C. Clemen, Jr., p.53.

沙尼亞俄軍停留的時間較長，且有些人被徵兵加入紅軍）。拉脫維亞有 3 萬 5 千人，立陶宛有 7 萬 5 千人。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可說愛沙尼亞損失了 4% 的人民，其他兩國損失了 1.5-2% 的人民。⁷⁷

當地人口的損失實際數目是難以估計的。為了彌補人力短缺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大批的俄國人、其他非波海人和被俄化的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他們的父母、祖先從沙皇時代就在俄羅斯定居，這些人甚至連愛沙尼亞語或拉脫維亞語都不太會說）被引入。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數以千計的俄羅斯官員被指派到共和國、行政區和地方社區等各個層級直接指導社會與經濟的變革。⁷⁸在許多外來人口中，佔最大多數的就是俄羅斯人。有些俄羅斯人是因為與蘇聯的其他共和國相比，波海三國擁有相對較好的資源和福利而主動前來的。不過也有一部份是被迫募集而來的。大批的俄國軍隊、官員、工人移民到波海三國，使俄羅斯人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成為波海三國境內第二大的民族（僅次於各國的本國民族）。

壹、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是蘇聯在波海三國進行侵略的第一個目標。1939 年 9 月 19 日，一艘被拘留在塔林的波蘭潛水艇脫逃，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通知並要求愛沙尼亞大使，認為愛沙尼亞政府無力保護她自己的海岸，蘇聯的波海艦隊（the Soviet Baltic Fleet）將負擔起這個責任。將近 16 萬名的蘇聯大軍移防到愛沙尼亞的邊境。蘇聯外長要求儘快議定蘇、愛軍事同盟以便能在愛沙尼亞建立蘇聯的軍事基地。⁷⁹1939 年 9 月 28 日在蘇聯強大的軍事脅迫下，愛沙尼亞與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a Pact of Defense and Mutual Assistance），同意蘇聯 2 萬 5 千名士兵駐軍愛沙尼亞並提供愛沙尼亞本土及周圍島嶼之海、空軍基地予蘇聯使用。條約簽訂的當日，蘇聯紅軍立即進駐愛沙尼亞。⁸⁰

⁷⁷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42.

⁷⁸ *Ibid.*, p.111.

⁷⁹ Walter C. Clemen, Jr., p.51;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15.

⁸⁰ Walter C. Clemen, Jr., p.51.

1940年6月16日蘇聯以愛沙尼亞秘密與拉脫維亞、立陶宛結盟從事不利蘇聯之活動，嚴重違反「互助條約」為由對愛沙尼亞下達「蘇維埃最後通牒」(the Soviet Ultimatum)。蘇聯要求愛沙尼亞：(1)立即建立一個有能力且有意願忠實履行「互助條約」的新政府。(2)為確保「互助條約」的執行及避免蘇聯駐軍可能遭受攻擊，愛沙尼亞應開放邊境並容許足夠的蘇軍進駐愛沙尼亞各重要據點。在蘇聯紅軍絕對的優勢下，愛沙尼亞不得不在最後期限前接受蘇聯的通牒。⁸¹6月17日蘇聯軍隊迅速佔領了包括首都塔林在內的愛沙尼亞全境。隨著國家的被佔領以及在蘇聯的完全控制之下，6月21日親共的新內閣成立。新政府上任後，一方面宣布廢止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所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另一方面，下令沒收民間武裝軍械以及給予愛沙尼亞共產黨(the Estonian Communist Party, C.P.E.)合法團體的地位，電視與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被限制僅能報導經政府批准後的資訊，人民的集會遊行亦被禁止。⁸²

與此同時，愛沙尼亞總統佩茨(Päts)及其他政治領導者不是被蘇聯驅逐出境就是被殺害。1940年7月愛沙尼亞重新舉行國會選舉，才獲得合法地位的愛沙尼亞共產黨，其成員連150個都不到，卻提出了選舉中唯一的參選人名單。選舉在「一黨獨選」(One-Party Election)及強迫動員選民投票的情況下，共黨以92.8%的得票率，獲得了所有席位，進而控制了整個國會。⁸³7月21日，新國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決議更改愛沙尼亞國名為「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Esto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E.S.S.R.)，並請求允許加入蘇聯。1940年8月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在無異議的狀況下，通過愛沙尼亞為第15個加盟共和國。

在蘇聯兼併後的一個星期之內，共產黨成為愛沙尼亞境內唯一的政黨並快速成長。1940年6月中旬，愛沙尼亞共產黨只有133名黨員，經過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黨員人數急速成長到1344名。到了1941年6月1日，共黨黨

⁸¹ 呂岳憲，頁56-57。

⁸² 呂岳憲，頁57。

⁸³ Walter R. Iwaskiw ed., p.18；呂岳憲，頁57。

員已經有 3732 人，其中有 37% 的黨員來自外地。⁸⁴（見表 2-3）黨內絕大部分新進的愛沙尼亞族黨員都是之前住在蘇聯，已經被同化得像俄羅斯人一樣。他們是在蘇聯併吞愛沙尼亞之後才回來工作的。至於當地的愛沙尼亞人因為不想間接助長蘇聯在他們國家內所進行的蘇維埃化政策，所以並不情願加入共產黨：1941 年本地愛沙尼亞族人在黨員總人數中約佔 90%，1946 年減少到 48%，到 1952 年只剩 41%。1960 年代中期，本地的愛沙尼亞人在黨中所佔的比率大約穩定在 50% 左右。在戈巴契夫的「改造」(Perestroika) 政策前，愛沙尼亞共產黨宣稱其擁有黨員 10 萬名，佔共和國人數的 1.6%，其中本地的愛沙尼亞族黨員不過半，而黨的高層仍舊是由俄羅斯人或俄化的愛沙尼亞人所組成。⁸⁵

表 2-3 1930 年-1980 年波海三國共黨規模與三國本國人在黨中所佔的比例

年 (1 月 1 日)	愛沙尼亞共產黨		拉脫維亞共產黨		立陶宛共產黨	
	規模 (× 1000 人)	愛沙尼亞 人的比例 %	規模 (× 1000 人)	拉脫維亞 人的比例 %	規模 (× 1000 人)	立陶宛人 的比例%
1930	0.3		1.0		0.65	
1934	0.387		1.15		1.10	
1936					1.942	
1937					1.499	
1938	0.11					
1939			0.4			
1940 6 月 1 日	0.133	88	0.967		1.741	
1941	2.036		2.789		3.138	
1941 6 月 21 日	3.75	65	3.13		4.62	53.3
1945	2.41		5.0		3.54	

⁸⁴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p.30;359, Table 6.

⁸⁵ Graham Smith,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A), p.134.

(續表 2-3)

年 (1月1日)	愛沙尼亞共產黨		拉脫維亞共產黨		立陶宛共產黨	
	規模 (×1000 人)	愛沙尼亞 人的比例 %	規模 (×1000 人)	拉脫維亞 人的比例 %	規模 (×1000 人)	立陶宛人 的比例%
1946	7.14	48.1	10.99		8.06	
1947	12.97		21.04		16.2	31.8
1948	16.4		28.7		22.2	
1949	16.9		31.2	53	24.5	
1950	17.6		34.2		27.8	
1951	18.9		37.3		29.9	
1952	21.2		40.3		34.7	
1952, 9月		41.5	42.0		37.1	
1953	22.3		42.2		36.2	38.0
1954	21.2		42.7		34.5	
1955	21.5	43.6	45.1		35.5	
1956	22.5	47.6	48.5		38.1	
1957	25.7	44.8	53.9		42.2	
1958	27.7	45.6	57.3		44.8	
1959	30.5	47.5	61.4	35	49.1	55.7
1960	33.4	48.6	65.9	32	54.3	
1961	37.8	49.1	72.5		60.6	
1962	42.5	49.4	78.2		66.2	
1963	45.7	50.5	82.0		71.1	
1964	49.8	51.1	8.2		77.5	
1965	54.8	51.9	95.7	39	86.4	61.5
1970	70.2		122.4		116.6	67.1
1975	81.5	52.3	140.0		140.2	68.5
1980	95.4		158.0		165.8	

資料來源：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pp.359-360.

在經濟方面，蘇維埃化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將愛沙尼亞的農業和工業整合入全蘇聯的經濟體制之中。1949年3月25-26日，約有8-12%（估計有2萬—8萬名）的愛沙尼亞鄉村人口被流放到蘇聯其他共和國的勞工營。⁸⁶由於農民害怕被流放，集體農場的數目以驚人地速度在一個月之內（1949年3月20日—4月20日）從8%提升到64%，⁸⁷而且集體農場也很快地成為鄉村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同時，愛沙尼亞的工業也迅速地轉軌到史達林主義下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而原本是擅長於輕工業和食品製造業的結構也轉變成以重工業為主導。在蘇聯的經濟體制下，共和國當局幾乎無權管理國內的工業和分配工業產品。即使是在1957-1965年赫魯雪夫的「區域經濟委員會」（Regional Economic Councils/ *Sovnarkhoz*）計畫下，仍然有超過75%的產出受到中央控制。⁸⁸1956年9月22日，愛沙尼亞部長會議主席Aleksi Müürisepp在 *Izvestiia* 上發表文章，批評相互依賴的經濟政策「使愛沙尼亞無法使用當地的原料」、「在未滿足共和國的需求前，產品就被命令輸出」、「將愛沙尼亞的專家們散佈至整個蘇聯，然後再引進俄羅斯人來取代這些人」。⁸⁹ Müürisepp最後一個觀點直指波海三國在人口議題上的痛處。

迅速地工業化使俄羅斯人和其他非波海人的蘇聯民族被合理化地引進愛沙尼亞，以彌補在戰爭中損失的專家。從1939年到1945年，愛沙尼亞因為戰爭、流放、逃亡等因素所損失的人口約有28萬，換句話說，1945年的總人口數比1939年的總人口數少了大約四分之一。⁹⁰因損失人口所造成的勞力短缺，完全由大批的移入者填補。1945年到1947年之間，大約有18萬的非愛沙尼亞人移民至愛沙尼亞⁹¹；1950年到1979年至少有超過40萬人移入。（見表2-4）

⁸⁶ *Ibid.*, p.133.

⁸⁷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99.

⁸⁸ Graham Smith, 1996(A), p.134.

⁸⁹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134.

⁹⁰ *Ibid.*, p.355.

⁹¹ *Ibid.*, p.112.

表 2-4 波海三國 1950-1979 年人口的增加(× 1000 人)

期間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自然增加	移入增加	自然增加	移入增加	自然增加	移入增加
1950-4	5.6	6.6	9.3	3.9	28.3	-20.6
1955-9	6.8	3.6	12.7	7.9	34.5	-6.0
1960-4	6.8	8.3	12.5	15.6	36.8	2.8
1965-9	5.3	9.0	7.8	14.2	29.1	5.8
1970-4	6.3	8.0	7.4	12.8	25.4	7.9
1975-9	4.4	4.9	3.7	9.1	18.8	6.2

資料來源：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p.369.

一直到 1970 年代晚期，因為蘇聯經濟的停滯及俄羅斯人和愛沙尼亞人之間的敵對增加等因素，才使移入愛沙尼亞的人潮減少。⁹²人口組成上的俄化再加上過低的出生率，使愛沙尼亞境內的愛沙尼亞族被嚴重稀釋。愛沙尼亞人在該國人口所佔的比例，從 1939 年的 90% 左右減少到 1950 年的 76%，1970 年滑落到 68%，到 1979 年人口普查時則只剩下 65%。(見表 2-5)

表 2-5 波海三國 1939-1980 年全國總人口數與本國族人所佔的比例

年(1月1日)	總人口數(以百萬為單位)			本國族人的比例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界)	1.134	2.00	2.575	88.2%	75.5%	80.6%
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界)	1.052	1.93	3.1	92%	77%	76%
1945	0.854	1.4	2.4	94%	83%	80%
1950	1.097	1.944	2.57	76%	63%	75%
1955	1.157	2.010	2.61	74%	62%	75%

⁹²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p.97.

(續表 2-5)

年(1月1日)	總人口數(以百萬為單位)			本國族人的比例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1960	1.209	2.113	2.756	74.1%	61.7%	79.4%
1965	1.285	2.254	2.954	70.9%	58.8%	79.8%
1970	1.356	2.364	3.128	68.2%	56.8%	80.1%
1975	1.427	2.465	3.295	65.7%	54.5%	79.9%
1980	1.474	2.529	3.420	64.5%	53.5%	80.1%
1989	1.566	2.667	3.675	61.5%	52.0%	79.6%

資料來源：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p.353

在各方面佔有優勢的俄羅斯人使愛沙尼亞族人在自己的國家內倍感威脅。俄羅斯人不願意整合入當地的語言、文化，相反地，還設法要同化他們。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在工作的地方，愛沙尼亞人被強迫要去適應外來者。蘇聯政府的語言政策是要將俄語的地位提升到「蘇聯人之間相互溝通的語言」，因此，在愛沙尼亞創造了一個俄羅斯人可以不用懂任何愛沙尼亞文的舒適環境，在日常生活的溝通上，幾乎無處不使用俄文。一位愛沙尼亞民眾提到被蘇聯統治的經驗時說道：「我們感覺好像不是居住在自己的國家內。」

電車裡和商店裡說的都是俄文；購物時，如果我說愛沙尼亞語，店員便會對我咆哮，如果換我的兒子去買，他一定會空手回來，因為他不會說俄文。」

⁹³同樣地，無論是在俄語學校或是在愛沙尼亞語的學校，愛沙尼亞語已經成為一門受歧視、無前途的課程。1978年，愛沙尼亞國內掀起俄化運動的新高潮：愛沙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和教育部長一律改換成能流利使用俄語的人；愛沙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宣布俄語在愛沙尼亞共和國享有優先權。1983年愛沙尼亞教育部更通過了一個新的教學計畫，限制使用和教授愛沙尼亞語，在愛沙尼亞學校中也要優先教授俄語。⁹⁴

⁹³ Anatol Lieven, p.82.

⁹⁴ 周慶生，「一種立法模式兩種政治結果——魁北克與愛沙尼亞語言立法比較」，*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頁24。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愛沙尼亞人使用俄語的情況反而在 1970 年之後銳減。⁹⁵經過整個 70 年代，自稱以俄文為第二語言的人在所有蘇聯共和國中都增加了，唯獨愛沙尼亞例外。拉脫維亞人認為可以流利使用俄文的人從 45.2% 提升到 56.7%，立陶宛從 35.9% 提升到 52.1%，然而，只有 29% 的愛沙尼亞人在 1970 年承認精通俄語，到 1979 年，這數字竟降到 24.2%。（見表 2-6）唯一可解釋這種情況的理由就是俄化運動已經在愛沙尼亞引起了反動。⁹⁶80 年代後期，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愛沙尼亞的民族菁英們一方面為恢復愛沙尼亞語言與文化的生存權利積極準備，另一方面也在為爭取蘇聯歸還愛沙尼亞的國家主權而謀劃。⁹⁷

表 2-6 波海三國人民以俄文為第二語言的比例
1970, 1979 和 1989 年的調查結果(%)

	1970 年	1979 年	1989 年
愛沙尼亞人	29.0	24.2	33.8
拉脫維亞人	45.2	56.7	64.4
立陶宛人	35.9	52.1	37.9

資料來源：Graham Smith,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502.

貳、拉脫維亞

1939 年蘇聯與德國簽署密約後，便開始積極地對拉脫維亞採取行動。10 月 6 日，在面臨蘇聯以十六個軍團逼臨拉脫維亞的壓力下，拉脫維亞簽訂「拉-蘇互助條約」(the Soviet-Latvia Mutual Assistance Pact)，同意提供蘇聯海、空軍的軍事基地並答允蘇聯駐軍，蘇聯則允諾協助防禦拉脫維亞，避免拉脫維亞捲入戰爭。於是自 10 月 23 日起，為數約 3 萬名的蘇聯紅軍開始進駐拉脫維亞的港口與軍事基地。1940 年 6 月 16 日，莫洛托夫對拉脫維亞駐俄大

⁹⁵ Anatol Lieven, p.95.

⁹⁶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213.; Anatol Lieven, p.95.

⁹⁷ 周慶生，頁 24。

使下達所謂「蘇維埃最後通牒」，並要求在晚間八時前回覆，否則蘇聯將揮軍進攻拉國。蘇聯指控拉脫維亞：(1) 與立陶宛、愛沙尼亞秘密締結「波羅的海同盟」(the Baltic Entente)。(2) 「拉蘇互助條約」簽訂後未能立即撤銷拉脫維亞於 1923 年與愛沙尼亞簽定的共同防禦條約 (Treaty of Defensive Alliance)。(3) 秘密參加「環波羅的海國家外長會議」(the Conference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Baltic States) 計畫對蘇聯不利之行動。(4) 與環波羅地海國家有愈來愈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5) 發行「波羅的海同盟」刊物--「波羅的海時事評論月刊」(La Revue Baltique)，從事對蘇聯不友好的報導與評論。因此，要求拉脫維亞政府 (1) 立即解散現有政府，重組另一個可以忠實履行「互助條約」的政府；(2) 開放拉脫維亞邊境及解除蘇聯駐軍的員額限制。在蘇聯武力的要脅下，烏爾瑪尼司 (Karlis Ulmanis) 政府不得不無條件地全面接受蘇聯的要求。⁹⁸

1940 年 6 月 17 日，蘇聯紅軍全面佔領拉脫維亞。6 月 20 日組成新內閣。7 月 14、15 日，新政府舉行新的國會選舉，只有共產黨所核准的候選人才能參選，其他非共黨派如農民聯盟 (the Farmer Union)、基督教民主黨 (Christian Democrats Party) 等反對立場的政黨領袖，則在選舉前夕被蘇聯的秘密警察逮捕並流放西伯利亞。國會選舉結果竟有 97.6% 的得票率，雖然所有西方政府都不相信這個結果，但是，卻是個令蘇聯政府感到滿意的數字。⁹⁹7 月 21 日，以無異議的方式通過克群斯坦 (Augusts Kirhensteins) 為新總統，烏爾瑪尼司總統則被放逐。當日，新國會宣布更改拉脫維亞國名為「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Latv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L.S.S.R) 7 月 23 日，新國會派遣由 20 名國會議員組成的全權代表團赴莫斯科，宣達拉脫維亞加入蘇聯的意願；8 月 5 日，獲得同意，於是拉脫維亞遂成為蘇聯第十四個加盟共和國。

拉脫維亞加入蘇聯以後，共產黨控制了政府和軍隊，且無論是在政治、

⁹⁸ 呂岳憲，頁 43-44。

⁹⁹ Walter R. Iwaskiw ed., p.100.

經濟、文化或是生活等層面上的領導單位，全都由俄羅斯人或被俄羅斯化的拉脫維亞人所擔任，例如：1949年3月里加市列寧區委員會宣傳部的30位非正職講師中，只有八位知曉拉脫維亞文。1945年末，絕大部分的黨員都是來自拉脫維亞以外的地區，其中多數的人不會說拉脫維亞語。1949年時，黨員人數中拉脫維亞人只維持了勉強的多數—53%，其中還包括完全俄化的拉脫維亞人，而土生土長的拉脫維亞人實際上只佔了黨員人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50年初共黨黨員人數有3萬4千224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見表2-3）。一直到1984年為止，拉脫維亞的共產黨黨員人數約有16萬人，佔全國總人口人數6%。¹⁰⁰

成為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的一部份，拉脫維亞共和國的經濟和社會被國家強迫支配的程度到了頂點：（1）經濟快速地由農業轉軌到重工業；（2）人口由原本壓倒性的拉脫維亞族人轉變成多民族的國體；（3）由農業優勢的社會結構改變成以工業工人都市化的社會為主。¹⁰¹在史達林主義大規模流放等殘酷的手段下，1951年末，就已經有98.4%的農村家庭併入集體農場。¹⁰²共和國快速地工業化，無可避免地刺激了大量的俄羅斯工人移民至此，成為城市勞工的主要來源，同時也使拉脫維亞從戰前的農業社會轉變成都市化國家。由於拉脫維亞人口始終無法提供足夠的勞工數量來完成帝國主義經濟目標，所以經濟移民不斷地增加，甚至連拉脫維亞共產黨人都對引起大量非拉脫維亞人移入的過度工業化政策感到不安。不過，當這些意見在1959年上達赫魯雪夫時，赫魯雪夫控訴這些政治領導人是民族主義者而遭到撤換。此後工業化更加速，在1959年到1989年之間，在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口成長了35萬，而拉脫維亞人只增加了9萬人。¹⁰³

拉脫維亞共和國的人口變化情況在波海三國中是最為極端的。戰後移入拉脫維亞的人並不比移入愛沙尼亞的人多，但是與1935年愛沙尼亞人佔將

¹⁰⁰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80.

¹⁰¹ Graham Smith, 1996(A), p.150.

¹⁰² *Ibid.*, p.151.

¹⁰³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p.111.

近 90% 的情況相較，拉脫維亞人在本國只佔 77%。¹⁰⁴ 由於共和國的低出生率¹⁰⁵ 使勞工短缺的情形惡化，再加上移入人口已是拉脫維亞共和國人口成長的主要原因，因此，拉脫維亞人對人口統計情況十分敏感，害怕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中會成為少數民族。1959 年拉脫維亞人佔全國總人數的 62%，1979 年，剩下 53.7%，到了 1989 年人口普查時，拉脫維亞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僅過半數，佔 52%。（見表 2-2）

除了經濟移民，還有二個特別的移民團體也造成相當數量的人口增加：軍人和戰犯。由於 North West Group of Military Forces 在里加設立總部，所以里加附近有特別大量的軍隊駐紮。當個人從軍中退休或解職時，許多人決定留在拉脫維亞，但實際上這個團體定居的人口數字通常還必須加上軍人的眷屬們。至於戰犯，則是因為拉脫維亞的經濟狀況較佳，許多人可以在此找到工作，因此，可以得到居留許可。根據拉脫維亞最有名的人口統計學家 Peteris Zvidrins 的統計，士兵和戰犯加起來，在整個 1980 年代共和國內的非拉脫維亞人口中，每年增加七千到八千人。¹⁰⁶

自 1944 年起，大批的俄羅斯人被有計畫的移民到拉脫維亞。除了能稀釋人口以加強對蘇聯的支持外，更助長了蘇維埃化和俄化的進程，也刺激幫助了政治的穩定和文化的同化。在蘇聯統治期間，俄文學校視拉脫維亞語為外國語，事實上，不管是在拉脫維亞的何處都視拉脫維亞語為外語。因此，俄羅斯人也不覺得有必要提升拉脫維亞語的能力。相反地，拉脫維亞人在拉脫維亞語學校就讀，學習俄文是必修課，因為俄文是進入更高、專業教育的先決條件，而且在大多數的工作上也會用到。這種俄語優勢的情形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期之後才逐漸改變。1970 年，以俄文為第二種語言的拉脫維亞人有 45.2%，1979 年的比率增加到 56.7%，而 1989 年的調查結果則顯示已經有 64.4% 的拉脫維亞人會俄文。（見表 2-6）至於在共和國境內會說拉脫維

¹⁰⁴ *Ibid.*, p.109.

¹⁰⁵ 1980 年，出生率降到空前的低，千分之十四。見表 2-8。

¹⁰⁶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p.111.

亞文的人，1979年時，僅佔全國人口的20.1%。¹⁰⁷

布里茲涅夫時代，拉脫維亞民族異議份子的活動比蘇聯其他共和國的要活躍許多，但是，若是與波海的兩個鄰國相比，就顯得較為溫和了。¹⁰⁸

參、立陶宛

1939年8月23日德、蘇簽訂密約時，立陶宛原本是屬於納粹德國的勢力範圍。後來，隨著德、波戰爭的發展，9月27日德國再次與蘇聯協議，以立陶宛為條件之一來換取蘇聯進一步的軍事合作。10月，蘇聯強迫立陶宛簽定「互助條約」(the Soviet-Lithuanian Mutual Assistant Pact)，允許2萬名蘇軍進駐立陶宛。

1940年5月16日，一名蘇聯駐立陶宛的士兵在立陶宛境內失蹤，蘇聯指稱是立陶宛警方蓄意的綁架和謀殺，要求立陶宛總理至莫斯科提出調查報告，雖然經過多次會議的協調，蘇聯仍舊拒絕接受立陶宛的解釋，並在6月14日對立陶宛下達「蘇維埃最後通牒」(the Soviet Ultimatum)。6月15日，立陶宛一答應「最後通牒」，在其邊境等候多時的紅軍便立刻大舉入侵立陶宛，不久，立陶宛全境便落入蘇聯的掌控。6月25日，新政府發表一連串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解除對共產黨的限令，立陶宛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如「共青團」陸續登記為合法社團，其他的政黨則陸續被宣布為非法並遭解散，立陶宛遂成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7月14-15日國會重新改選，無疑地，共黨是唯一的參賽者也是最大的贏家。新國會通過更改立陶宛的政體為蘇維埃制，並更改國名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Lithuanian Soviet Social Socialist Republic) 8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告接受立陶宛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第十三個加盟共和國。¹⁰⁹

就如同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一般，在蘇聯的統治之下，立陶宛除了共產黨以外，其他的政黨活動完全被禁止。權力的機構一如政黨、秘密警察和政

¹⁰⁷ Walter R. Iwaskiw ed., p.260.

¹⁰⁸ Graham Smith, 1996(A), p.155.

¹⁰⁹ 呂岳憲，頁27-30。

府，一開始主要都是掌握在俄羅斯人手裡。蘇聯統治初期，立陶宛人在該國的共黨人數比例只有 18.4%。¹¹⁰1950 年代初，許多想要在經濟、文化或政治界謀得一份較好工作的大專畢業生理解到蘇聯的統治不是短暫的，所以這些年輕人選擇加入共產黨。1952 年立陶宛申請加入共黨的人數特別高，有 9224 名，但是，此後十年再也沒有達到過這個數字。¹¹¹1989 年時共黨黨員的人數增加到 20 萬 5 千人，其中許多人都是機會主義者，與最初加入共黨的那些狂熱份子不同；甚至還有一些人加入共產黨是希望能藉由進入統治階級而保護立陶宛的傳統、語言和文化。¹¹²不過，雖然立陶宛人在該國總人口中佔了 80% 之多，但卻只有在 1950 年代末時立陶宛人才曾一度成為該國共產黨中的多數。¹¹³

在經濟方面，1941 年初，國家就幾乎接管了所有的工業。到 6 月份時，只剩下 10% 的商店仍為私人所擁有。¹¹⁴而立陶宛農村集體化的進程則明顯慢於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1949 年 6 月底只有 34% 的農場完成集體化，然後，在一批新的流放行動之後，1949 年尾，集體化達到 62%。1950 年春時農村集體化的成果甚至是呈暫停的狀態，即使到了 1950 年的 7 月，還有 27% 的農場維持私有，不過，到了該年年底，私有農場的數字就驟降為 11%，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又一批人被流放。¹¹⁵

由於游擊活動、流放和逃亡等原因，立陶宛的人口從 1939 年到 1955 年損失了約 100 萬人。（見表 2-7）但是，立陶宛一開始並沒有發生像波海其他兩個國家一樣的情形：為了彌補失去的人口，俄羅斯人和其他共和國的人大量湧入，迅速地在人口統計數字上造成明顯的俄化。因為立陶宛有相對較大規模的本國人口、較高的出生率與較低程度的工業化，所以使得俄國人移入較少。立陶宛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始終保持著絕大多數，1960 年時立陶宛人佔全國總人數的 79.4%，1970 年和 1980 年都佔有 80.1%。（見表 2-5）

¹¹⁰ Walter R. Iwaskiw ed., p.182.

¹¹¹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p.131-132.

¹¹² Walter R. Iwaskiw ed., pp.182-183.

¹¹³ Graham Smith, 1996(A), p.172.

¹¹⁴ 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p.32.

¹¹⁵ *Ibid.*, pp.102-104.

再加上立陶宛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兩國相比，擁有較高的出生率，所以較容易彌補損失的人口。（見表 2-8）除此之外，較農業化的立陶宛有比較多存留的農村勞力，得以利用在支持工業發展，因此，限制了人口移入也減輕了移入人口的影響。例如，1945 年到 1955 年之間，愛沙尼亞增加了約 23 萬名的移入人口、拉脫維亞增加了 53 萬 5 千人，而立陶宛只增加了 16 萬人。（見表 2-7）

表 2-7 1945-55 年波海三國人口的改變(× 1000 人)

使人口數增加或減少的原因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1945 年底，人口數：全國總人數	850	1,400	2,400
本國族人	800	1,200	1,900
1946-53 年遭逮捕以及流放	-80	-100	-260
游擊活動中死亡	-15	-25	-50
出生超過自然死亡的部分：			
本國族人	+50	+60	+300
其他族群	+20	+40	+50
移入人口：			
本國族人	+100	+100	+40
俄羅斯人和其他	+230	+535	+160
1955 年初，人口數：全國總人數	1,157	2,010	2,613
本國族人	865	1,250	1,980
在該國土生土長的人口損失：			
1945-55 年	-90	-125	-310
1939-45 年	-280	-600	-700
1939-55 年總共損失	-370	-720	-1000
以 1939 年的人口為基準，1939-55 年改變的比例	-33%	-36%	-32%
以 1939 年的人口為基準，移入人口的比例	29%	31%	6%

資料來源：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p.359.

表 2-8 蘇聯和波海三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1940-1980 年(每年，每千人)

年	出生率				死亡率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蘇聯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蘇聯
1940	16.1	19.3	23.0	31.2	17.0	15.7	13.0	18.0
1945	15.9				19.4			
1950	18.4	17.0	23.6	26.7	14.4	12.4	12.0	9.7
1955	17.9	16.4	21.1	25.7	11.7	10.6	9.2	8.2
1960	16.6	16.7	22.5	24.9	10.5	10.0	7.8	7.1
1965	14.6	13.8	18.1	18.4	10.5	10.0	7.9	7.3
1970	15.8	14.5	17.6	17.4	11.1	11.2	8.9	8.2
1975	14.9	14.1	15.7	18.1	11.6	12.1	9.5	9.3
1980	15.0	14.0	15.1	18.3	12.3	12.7	10.5	10.3

資料來源：Romuald J. Misiunas &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P.367.

大批移民而來的俄羅斯工人被波海三國的人民視為是所有蘇聯的產物中最有害的遺產，而只有立陶宛躲過這命運，不過這種情形也只維持到 1974 年立陶宛共產黨第一書記 Antanas Snieèkus 死前。Snieèkus 的背景不像愛沙尼亞或是拉脫維亞的領導人——在俄羅斯出生、成長，1940 年時才抵達他們的管轄地，這位立陶宛共黨書記是波海三國中唯一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共產黨員。他領導立陶宛從 1940 年到 1974 年逝世為止。在統治的前半期，他嚴格地執行來自莫斯科的命令，但是在統治的後半期，他卻反抗中央，協助加強立陶宛人與中央當權者對立的立場。不過 Snieèkus 的繼任者 Petras Griskevicius (1974-1987)，卻非常順從莫斯科的命令，最佳的例證就是，答應蘇聯在立陶宛北方 Ignalina 建立核能電廠。根據當時立陶宛的許多反對意見，如果是 Snieèkus 在位，他可能不會接受這個計畫，因為這個計畫不只增加了立陶宛人生活上潛在的危險，而且還引入了大批的俄羅斯工人，使立陶宛人在該城成為少數民族。¹¹⁶

¹¹⁶ Graham Smith, 1996(A), p.173.

雖然立陶宛人總是佔絕大多數，俄羅斯人在立陶宛也沒有造成如愛、拉兩國人口組成上俄化的情形，但是，立陶宛人卻同樣也害怕俄國語言和俄國文化在他們生活中鯨吞蠶食。因為，語言的俄化在立陶宛也像蘇聯其他地區一樣被推動。自幼稚園開始教授俄文，立陶宛語的高中和大學課程中許多科目規定只能以俄語教授，目的是確定學生能流利的使用俄語。雖然絕大多數的立陶宛人送他們的小孩去立陶宛語的學校就讀，但是也有一些父母選擇送他們的小孩到俄語學校讀書，因為他們認為俄文教育能增進小孩未來生活的機會。此外，1975 年以後所有的博士論文只能用俄文書寫。¹¹⁷許多人視博士論文要用俄文寫這件事是對立陶宛語的未來造成很大威脅，因為這意味著學生們是以俄文來訓練其批判和科學思維的能力，而不是用立陶宛語。至於，蘇聯的雙語政策是在兒童學立陶宛文之前就提供他們一個有組織的俄文教育，這同樣也威脅到立陶宛語的未來發展。¹¹⁸

儘管在 1980 年代的早期，立陶宛顯得很平靜，但是，在平靜的表面下，卻是充滿了極度的不滿與不安。由於蘇聯壓迫的統治，反抗的行動只能如浮上水面的泡沫般零星地發生。

肆、地區討論

由於移民到波海三國的俄羅斯人絕大部分是因工業化而來，所以除了瞭解三國人口組成上的俄化情形外，俄羅斯人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分佈狀況也值得一提。

¹¹⁷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p.120.

¹¹⁸ Graham Smith,1996(A), p.173



圖 2-1 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俄羅斯人大量聚集居住的區域

資料來源：Chauncy D. Harris, “The New Russian Minorities: A Statistical Overview”, *Post-Soviet Geography*, vol.34 no.1(1993), p.11.

由圖 2-1 可看出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塔林、Narva 附近的工業區（該處有兩個熱力發電廠）Kohtla-Järve（因開採油頁岩）和 Peipus 湖西邊。¹¹⁹在首都塔林，1926 年時愛沙尼亞人佔該城人口的 86%，1979 年時，愛沙尼亞人只佔 52%，俄羅斯人則增加到佔該城人口的 38%，甚至到了 1989 年，愛沙尼亞人所佔的比率只剩下 47%，而俄羅斯人的比率則高達 42%。¹²⁰除首都塔林之外，俄羅斯人主要還聚集在愛沙尼亞東北邊的幾個城市，如 Kohtla-Järve 有 77% 的俄化人口，Sillamaä 則有 97%，Narva 也有 96%，與拉脫維亞東部的 Latgale 城相比¹²¹，愛沙尼亞東北部城市的俄羅斯

¹¹⁹ Chauncy D. Harris, “The New Russian Minorities: A Statistical Overview,” *Post-Soviet Geography*, Vol. 34, No. 1 (1993), p.10.

¹²⁰ *Ibid.*, p.18.

¹²¹ Latgale 城好幾世紀以來就存有來自波蘭和俄羅斯族群，在文化上和人口組成上有著強烈的斯拉夫成分。Paul Kolstoe, p.133.

人絕大多數都是戰後的移民，不過，卻又比住在塔林或塔林附近的俄羅斯人要根深於愛沙尼亞這塊土地。Narva 的俄羅斯人中有 69% 的人，若不是在愛沙尼亞出生的就是在此居住超過 30 年以上。1991 年 11 月 Narva 城市會議主席曾表示，該城的居民住在愛沙尼亞這塊土地上已視他們自己是愛沙尼亞人。不過，事實上居住在全是由俄羅斯人組成的社區中，他們絕大部分是被孤立於愛沙尼亞的文化之外。¹²²

在拉脫維亞，俄羅斯人聚集在首都里加以及共和國東部一連串零星的地區（見圖 2-1）。1926 年里加人口中有 60% 是拉脫維亞人，1959 年里加的拉脫維亞族人剩下 45%，而俄羅斯人則佔了 39%，1970 年以後的統計資料顯示俄羅斯人在該城的比例已經超過拉脫維亞人了。¹²³此外，俄語人口在里加佔絕大多數：1989 年里加有 47% 的俄羅斯人，而俄語人口卻佔全城人口的 58%，相較之下，拉脫維亞人佔 36%，而說拉脫維亞語的人也佔 36%，這表示，除俄羅斯族外，其他的族群也是以俄語為母語或第二語言，因此在首都里加俄語人口是主要的人口。¹²⁴這種情形不只在里加出現，幾個拉脫維亞的大城市俄語人口也同樣佔了絕大多數，例如，東部的城市—Daugavpils，俄語人口佔全城人口的 87%；另一個城市—Jurmala，全市有 53% 的人是俄語人口。¹²⁵

在立陶宛，俄羅斯人集中在首都維爾紐斯、Klaipeda 不凍港和一些根據蘇聯的計畫所設立的工廠與發電廠地區，如 Snieckus。不過雖然俄羅斯人主要集中在維爾紐斯，但是卻不像塔林、里加有著相當數目或甚至超過本國族人的俄羅斯人。維爾紐斯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城市，立陶宛人一直在持續地增加，1959 年時立陶宛人佔 34%，1970 年增加到 43%，1980 年達到 47.3%，而俄羅斯人的比例則始終不曾超過 30%。¹²⁶Snieckus 是立陶宛唯一以俄羅斯人以及俄語人口為主要人口的城市。這些居民幾乎都是在

¹²² *Ibid.*

¹²³ Chauncy D. Harris, 1993, p.18.

¹²⁴ *Ibid.*, p.18.

¹²⁵ Anatol Lieven, p.434.

¹²⁶ Chauncy D. Harris, 1993, p.18.

Iganlina 核能發電廠工作的工人，與居住在立陶宛境內其他地區的俄羅斯人相比，這些俄羅斯人較為孤立，和立陶宛社會並太多的交流與融合。¹²⁷

第四節 小結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表面上是以列寧的建議為架構，但實質上卻體現了史達林的主張：結合所有民族，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共同體。在此「共同體」之下，各民族共和國的權利受到極大的限制。1924年1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第二章第四條、1936年史達林憲法第二章第十七條、1977年布里茲涅夫憲法第八章第七十二條，雖均明文規定各加盟共和國保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能自由選擇退出聯盟與否。

1939年8月23日，德、蘇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大敵在莫斯科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震驚了全世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秘密的版圖議定書將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劃歸予蘇聯。後來立陶宛也劃入蘇聯的版圖。就如同蘇聯官方常喊的一句口號「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National in Form, Socialist in Content”），蘇維埃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政策同樣也可用「波羅的海的形式，俄羅斯的內容」（“Baltic in Form, Russian in Essence”）來說明。¹²⁸

蘇聯佔領波海三國後，隨之而來的是大量且強迫的人口與文化俄化、政治與經濟蘇維埃化，而且重要職務完全改以俄羅斯人擔任。數以萬計的本地人民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殺害。放逐行動所造成的恐怖，使農村集體化進行得既順利又迅速。之後又因為工業化將大量的俄羅斯人與其他斯拉夫人移民到這裡，一方面是為了填補人力缺口，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促進同化、鞏固政權。此外，有鑑於波海三國的地理位置與政權的需要，成千上萬的俄羅斯軍隊及其眷屬也移居此地。波海三國原本的人口就不多，再加上低出生率，使得人口組成上俄化的問題備受注目，尤其是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情況更為嚴重。

¹²⁷ Paul Kolstoe, p.140.

¹²⁸ Walter Kolarz, p.109.

移居波海三國的俄羅斯人或其他俄語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居住在城市裡。因此在首都或是幾個大城市中，幾乎要失去當地應有的本國特色，快要成為俄羅斯人的城市。許多波海人害怕持續的移民浪潮將會淹沒他們的民族文化。移民而來的俄羅斯人並不覺得他們是到了「外國」，也不想融入當地的生活；相反地，他們希望當地的居民能改變並學習俄國人的生活方式。俄羅斯人這樣的態度引起了波海人的憤怒。

波海三國早期的歷史發展都受到外國菁英的影響：立陶宛受到波蘭的影響；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則受到德國的影響。十九世紀中葉，三國發展了民族主義，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波海三國獨立並擁有相當繁榮的經濟體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蘇聯併吞，淪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蘇聯統治的壓迫下，民族思想與民族運動無由伸展，一直到 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後，波海三國趁此改革之機，動員群眾的力量，從要求經濟的自主權逐步發展成要求國家的獨立，最後終於實現獨立的願望。